

古籍整理论文集



甘肅人民出版社

古籍整理论文集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亦君

封面设计：刘萧棣

古籍整理论文集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230,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

书号：17096·58 定价：1.35元

题 辞

一九八二年七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召开第三届年会于兰州，会员赴会者近百，各携论文一篇，而以谈及古籍整理者为最多。以会期迫促，未遑一一宣读。会议既毕，余因委托张孟伦、王秉钧、郑文诸同志分任整理之事，而由副会长彭锋同志总其成。斟酌损益，悉出一手，编为古籍整理论文集，经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行见是编流布遐迩，贡所见于当世，于整理古籍不无小补。此后每届年会，将继续此刊布论文集，藉收观摩之益。其于我会学术研究之提高，亦必日进不已，愿与同志共勉之。

张舜徽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

F1-H3P/21

目 录

略谈古籍整理·····	李秋沅 (1)
古籍整理之我见·····	王继祥 (16)
甲骨文字研究与古籍整理工作·····	常正光 (24)
论句读·····	朱新夏 (38)
怎样标点古书·····	管敏义 (52)
阅读古籍应注意的一个问题·····	朱太岩 (70)
勘正新点校本廿四史顿号误用两则·····	张大可 (92)
今本《公孙龙子》考辨述评·····	赵吉惠 (98)
《鬼谷子》研究·····	杜宝元 (113)
刘知几的史学方法论·····	符定波 (127)
郑樵的文献学理论初探·····	姜曾泉 (141)
简评《中国古代史籍举要》·····	冯端林 (154)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刻不容缓·····	林庆云 (165)
试谈《史记·将相表》之“倒书”·····	施 丁 (175)
论《史记》与《汉书》·····	吴忠匡 (195)
新发现的一份西汉地下历史文献·····	伍德煦 (219)
《晋书·陶侃传》的几个问题·····	吴铨铨 林校生 (239)
两唐书本纪繁简论·····	宋衍申 (256)
《续通鉴长编·修换事目》考略·····	裴汝诚 (273)
《续资治通鉴长编》校勘释例·····	吴绍烈 (286)
《宋史》辨正二十例·····	顾吉辰 (299)

略谈古籍整理

李 秋 沅

一、整理古籍的重要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据估计，自有文字以来至一九一九年的文化典籍达八万种以上。它们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辛勤劳动创造的文化的结晶。这些文化遗产的光辉曾经炫耀于古代，并且在今天也还有其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也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由此可见，整理古籍是有其重大的意义的。

当前，我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正

在创造灿烂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首要的，当然要以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为基础，但同时又离不开我国各民族的光荣历史和文化传统。为此，就必须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这样就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同整理古籍必然地联系了起来。

要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首先必须对它们加以整理。我国古代的典籍多是用文言文记录的，而且年代久远。学习和利用起来不仅有文字上的障碍，还有时代的隔阂。这就给今天学习古籍和继承文化遗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继承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就有必要对它重新加以整理出版。中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这是很正确的。解放以来，我们虽然在古籍整理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但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整理出来的仍是微乎其微的，工作任务仍然是十分艰巨的。

整理古籍，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需，也是丰富大学文科教学内容的重要途径之一。解放以来，高等学校文科课程设置单一，许多应当建立的新学科迄未建立起来。以历史专业为例，我国是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国家，流传至今的历史资料，有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敦煌一吐鲁番文书、满文老档、藏文经版、彝文古典文献，以及蒙古、新疆出土的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过去只在某些方面作了些整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甲骨文、金文；但还有许多方面尚未或刚刚开始研究，如藏学、蒙古学、敦煌学、简牍学、方志学、古代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等。在这些学科中，有些学科国外学者已捷足先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们如果能充分利用自己所具备的有利条件，及时组织人力加以整理研究，无疑会取得更

大的成就，也就会给高等学校中国文史两科的教学增添不少新的内容。

整理古籍的实际工作，是培养整理研究古籍人才的一个有效办法。目前，我们整理古籍的任务十分繁重，而整理古籍的人材在质和量两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设置专业，进行培养外，组织老专家带领现有的中青年专业人员从事古籍整理，这在当前不失为一个更为有效更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总之，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整理古籍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中央把这件事提到国家的工作日程上是完全正确的，有远见的。

二、重视古籍整理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好传统

我国不但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而且是保存古代典籍最多最完整的国家。大量典籍之所以被保存下来，是和历代政府都设有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搜集、整理、保管分不开的。

“史”就是最早的文书兼图书档案管理员。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民间本无藏书。战国以后，私人讲学之风盛行，民间逐渐有了一部分藏书。但是直到唐朝以前，由于印刷术尚未发明，各种文化典籍主要是写在简牍上或绢帛上，抄一部书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和财力，因此私人藏书有限，图书典籍主要集中在政府手里。书籍如此集中，一遇天灾人祸，图书损失就很大。中国图书的聚散几乎是和政治上的治乱相一致的。纵观秦汉以下二千年的历史，每当一个统一的强盛的封建王朝建立后，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都有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古籍整理方

面，都曾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汉、唐、宋、明、清，无一不是这样。

经过秦始皇焚书和秦汉之际的战争，书籍大量被毁。西汉王朝建立以后，朝廷很重视图书的搜集整理，因而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当刘邦初入咸阳，诸将争着抢分金帛财物的时候，肖何即注意收集国家的全部图书档案。惠帝时明令废除秦朝的“挟书之律”，民间藏书稍有出现。到汉武帝时，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汉朝政权稳定，国力强盛，因而在文化上要求有相应的发展。汉武帝深感“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不利于从文化思想上加强统治，“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至成帝时，令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各种图书搜集渐臻完备。据《七略》所载，当时国家藏书有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此据《古今书最》。《隋书·经籍志序》作三万三千零九十卷）。与此同时，成帝还组织以著名学者刘向、刘歆为首的专门班子，对这些图书进行全面的分类整理编目。他们写下了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的分类图书目录《别录》和《七略》。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光辉成就。

王莽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图书又一次遭受很大损失。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立即采取措施，“采求阙文，补缀漏遗”，搜求遗书。于是，甚至一些“遁逃林藪”的学士，也都“抱负典策，云会京师”（《后汉书·儒林传序》）。正是由于这些措施的实行，所以“石室、兰台，弥以充积”（《隋书·经籍志序》）。

东汉末年，董卓作乱，献帝西迁，图书遭到严重损失。以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其间虽然有的统治者比较注意搜集图书，如梁武帝、梁元帝、北魏孝文帝等，但总的情

况是国家藏书匮乏。尤其是北周攻破江陵时，梁元帝集中在该地的图书，全部付之一炬，使古代典籍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

隋统一南北后，文帝接受秘书监牛弘的建议，下诏征求遗书。每献书一卷，赏缣一匹，校写完毕，书仍归还原主。在这个政策的奖励下，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国家藏书达到三万余卷。到大业末年，国家藏书竟达数十万卷。

唐朝国家强盛，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李世民平定洛阳王世充后，立即派人把东都的藏书由水路运回长安，中经底柱，多被淹没，余下的仅十分之一，但仍不下八九万卷。唐太宗即位后，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购募遗书”，“数年间，群书略备”（《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宋朝承五代战乱之后，图书残缺较多。宋太祖于乾德四年下令向民间征书，同时由政府直接刻印图书。

宋代以后，雕板印刷发达，私人藏书大增。但历朝政府仍然很重视古籍的整理，如宋代由国家整理编辑了好几部大的类书、总集，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

明代永乐年间，政府组织了以解缙为首的编辑组，费时六年，编辑了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全书共计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包括目录凡例六十卷），收录各种图书七八千种。它对于保存我国古籍起了很大作用。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有不少书就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

清代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是重视。康熙、雍正时，先后命陈梦雷、蒋廷锡等编纂了一部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乾隆时，清朝政府又组织了以纪昀为首的一大批著名学者，编辑了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

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多种，七万九千余卷，抄为七部，分置于北京、沈阳、热河、镇江、杭州、扬州等处。《四库全书》的编辑过程，也是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过程，虽然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也销毁了不少书，但总的说来，在搜求古籍，分类编目，撰写提要，辑佚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影响下，整理古籍成了清代学术的一个特点。清代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

我国古代的典籍虽然遗失毁灭很多，但仍有大量典籍流传到现在。我们的祖先不仅为全人类创造了大量的文化财富，而且把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了下来。他们的成就是我们的骄傲，他们的努力是我们今天从事整理古籍的一种鼓舞力量。

三、古代整理古籍的几个方面

整理古籍在我国有很好的传统。据史书记载，孔子就是个整理古籍的专家，是整理古籍的祖师爷。相传《书》、《诗》、《易》、《礼》、《春秋》，都是孔子根据古代的政治文献、历史记录、卜筮记录，以及官府所采集的诗歌民谣，加以删削整理编辑而成的。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虽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和孔子删定诗书、把儒家的文献系统地加以整理，使之便于研究，也是分不开的。从孔子以后，历代都有许多学者在总结发展古代文化的同时，又从不同方面对古籍进行整理，并做出了重大的成就。回顾两千年来我国在古籍整理方面所作的工作，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训释文字

中国古代的典籍，大都是以古代汉语记录下来的。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尽管发展是缓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个字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读音和词义，这就给后人阅读古典文献带来困难。这种困难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增加。两汉人读先秦的书会遇到语言文字的障碍，唐宋人读先秦两汉人的著作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从汉代以来，就有许多学者为古代文献的文字作注音释义的工作。如汉代毛亨的《毛诗诂训传》、郑玄的《三礼注》、应劭的《汉书音义》、服虔的《汉书音训》、赵岐的《孟子章句》、许慎的《淮南子注》、王逸的《楚辞章句》等。后来的《史记》三家注、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颜师古的《汉书注》、李贤的《后汉书注》、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等人的《五经正义》等也都属于这一类。

2. 阐述文义

战国末年至西汉的一些儒生，为了阐明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修撰了各种解经的专书，有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谷梁赤的《春秋谷梁传》等。宋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属此类。其中有些书虽然也注释文字，如《四书集注》等，但其着重点在发掘古籍的思想内容，可以说这类书既是整理又是研究。

3. 补充事实

南北朝以后，注释古书突破了随文释义的体例，进而发展为以补充史实为主的新体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李善的《文选注》等是这一类的代表作。

4. 编辑各种文集

古人著书，除史书外，大都不是先有全书结构而后为文，而

是即事写文。作者生前往往没有汇编成书，死后才由他们的弟子或亲友替他编成集子。先秦诸子以及后来许多文学家的别集，大都是这样编辑起来的。魏晋以后，文学发达，作家辈出，私人著述渐多，于是有《昭明文选》、《玉台新咏》、《花间集》等文章诗词的选集出现。唐宋以后，为了适应科举取士的需要，又有各种类书的编纂。如唐代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徐坚的《初学记》，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明清以后，典籍繁多，于是丛书便应运而生。或将古今人著述合刻一编，以便学者博览群书，如《汉魏丛书》、《抱经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等；或按类合刻为一编，便于进行专门研究，如阮元、王先谦的《皇清经解》、《续经解》、曹寅的《栋亭五种》（字书韵书）；或一人所著各书合为一编，便于对各个专家进行全面研究，如王夫之的《船山遗书》、顾炎武的《亭林遗书》等。

5. 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础上，编订图书目录

我国图书目录之学源于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校定皇家藏书后写成的《别录》和《七略》。刘向的《别录》是最早的书录解题，刘歆的《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专著。《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辑略》是总论，内容包括总序和其它六略的小序，说明了汉以前各家学术流派及其渊源。其他六略是按六类分别著录当时皇家所藏的各种图书。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是在《七略》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这样的目录，不仅仅给读者提供了藏书的情况，而且给读者指示了学习的门径。刘向、刘歆父子所开创的这一优良传统，为唐朝初年长孙无忌等编撰的《隋书·经籍志》所继承。到了宋代，目录之学进

一步发展，除了各类书目之前有小序外，又于每个书名之下再加解题，对一书的作者、主要内容、版本等，作简明的介绍，对书中的谬误加以驳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而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是在这方面集大成的巨著。

6. 对古书的文字及内容进行校勘、考证、辨伪

要对一本书的内容有正确的理解，首先需要有好的本子。但是由于辗转传抄或刻板不精，往往会出现各种讹、脱、衍、倒的现象。因此校勘文字就成为从事研究的先决条件。陈垣先生说：“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校勘之学从刘向刘歆开始，经唐至宋而大盛，不仅总结出一整套校勘程序，而且出了一些校勘名家。到了清代，校勘学更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清代的考据学家同时也是校勘学家，而以戴震、卢文昭、丁杰、顾广圻为最著名。从前许多讹缪脱漏不可读的书，经清人精心校勘，方可诵读。在这方面，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和戴震校的《水经注》，成就尤为突出。

考据与校勘是紧密相联的，但二者又有所不同。校勘主要是校订文字的异同，判定其是非，力求恢复古典文献的本来面貌。而考证则主要是考订文献内容的错误。诸凡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方面的错记或错引，均属考证的范围。在这方面清朝学者的贡献最大，顾炎武、钱大昕、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名家辈出，代表了这一时代学术的主流。

辨伪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辨别古籍本身的真伪，一是辨别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某一事情的真伪。书之有伪，由来已久，造假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有造假就有辨伪。班固在《汉书·

艺文志》的自注中，多次指出某书为“依托”或“似依托”。以后历代均有人陆续辨明一些伪书。明清以后，先后出版了一些辨伪的专著。有辨一书之伪的，如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等；有辨多种伪书的，如宋濂的《诸子辨》、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

7. 辑佚

辑佚是原书已佚，后人把前人修纂的类书及其他书籍的正文或注疏中所引用的该书的内容，搜集在一起，使其全部或部分恢复原貌。汉唐间的许多古籍，今日还能被我们略窥一斑，实在应归功于辛勤地辑佚的学者们。张澍的《二酉堂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丛书》、黄奭的《汉学堂丛书》、茆泮林的《茆氏辑十种古书》等丛书，都是辑佚书的专集。

以上是我国古代学者整理古籍工作的几个方面。他们在每一个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并且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经验。

四、整理古籍中的求实精神

求实精神就是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是整理古籍不可缺少的条件。两千年来，前辈学者在古籍整理方面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是和他们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分不开的。前人整理古籍的求实精神，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点：

1. 大胆怀疑，善于提问

在整理古籍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只有发现了问题，考辨才有下手处，然后才能定真伪定去取。但发现问题要从善疑开始，这就是所谓“读书得间”。当然，大胆怀疑决不是无根据

的胡疑。《古文尚书》是伪书，现在已经不成问题。但是这部书从东晋初年问世后，很长一个时期，人们都以伪为真。唐朝初年，孔颖达作《五经正义》、陆德明作《经典释文》都采用此书。但从南宋至清，一些学者如吴棫、朱熹、梅鷟等对它产生了怀疑，提出了问题。在提出问题之后，经阎若璩、惠栋等人广征博引，细心考证，确定了作伪的证据，剥掉了这部书的神圣外衣，得出了公认的正确结论。由此可见，善疑是作出正确结论的起点。

2. 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这种精神在清代考据学家中最为突出。许多学者都把“实事求是”奉为自己治学的圭臬。清代考据学家钱大昕在其《廿二史考异序》中说：“桑榆景迫，学殖无成，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也说：“以予之识暗才儒，碌碌无可自见，猥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则予怀其亦可以稍自慰矣”。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清人的治学经验总结为以下几点：

甲、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槟。

乙、选择证据，以古为尚。

丙、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丁、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戊、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己、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庚、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以上几点经验中贯穿的根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这是清代优秀学者奉行的一条根本原则。这条原则中既包含着他们的治学精神，也包含着他们的治学方法。

3. 信以存信，疑以存疑

司马迁著《史记》，是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整理古籍的辉煌成果。班固评论《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除了表明作史者的政治道德品质之外，还包括作者鉴别史料的能力。例如《史记·五帝本纪》就是在仔细辨别考订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又如《老子列传》，在司马迁的时代，对于老子其人，就有种种传闻。司马迁在鉴别史料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倾向，即认为老子就是李耳。但对其他两种传闻（说老子是老莱子或周太史儋）也录而备考。

司马迁这种信以存信，疑以存疑的精神，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司马光的《通鉴考异》中也可见到。裴松之在他的《上三国志注表》中说：“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当他遇到“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的情况时，就采取“并皆抄纳，以备异闻”的作法。司马光在编写《通鉴》时，广采各种书籍，但各书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往往不同。他从中选择可信的记载写入《通鉴》，而将未采用的说法编成《通鉴考异》，并说明去取的原因，供后来的学者参考判断，免生疑惑。

郦道元注《水经》，也是采用这种谨严的态度。他对于一些一时闹不清的问题，就说“非所详也”，或说“未知所是”，“未知所从”，不轻下结论。

我国古代优秀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是我国史学最重要的优良传统。这个优良传统今天仍在